

鄂南文化研究系列丛书

鄂东南方言研究

王宏佳 编

鄂东南方言研究

王宏佳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鄂东南方言研究/王宏佳编.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9.12

ISBN 978-7-216-09586-0

I. 鄂… II. 王… III. 西南官话—方言研究—湖北 IV. H1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18606号

责任编辑:杨 猛 刘婉玲

封面设计:董 昫

责任校对:范承勇

责任印制:谢 清

出版发行:湖北人民出版社

印刷:武汉市籍缘印刷厂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数:480千字

版次:2019年12月第1版

书号:ISBN 978-7-216-09586-0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道268号

邮编:430070

印张:30.75

插页:2

印次:2019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价:105.00元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本社旗舰店:<http://hbrmcs.tmall.com>

读者服务部电话:027-87679656

投诉举报电话:027-87679757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由本社负责调换)

序

鄂东南方言属于赣语，处于南北方言、官话和非官话的过渡地带，不光市县之间有的难以通话，就是市县内部的乡镇之间也有显著的方言差异。正因为地位特殊，情况复杂，所以历来受到学界的关注和重视。20世纪80年代，日本著名语言学家桥本万太郎先生就曾调查过鄂东南方言；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方言调查实习，经常以鄂东南方言作为调查对象；2015年启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鄂东南8个市县的方言全部纳入工程计划，由此可见鄂东南方言地位的特殊和价值的重要。

最早全面报道鄂东南方言的当是赵元任等先生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1948）。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方言研究的升温，鄂东南方言的研究也出现了新的气象，出版了《蒲圻方言》（1989）、《大冶方言语法研究》（1994）、《通山方言志》（1994）、《鄂东南方言音汇》（2002）、《咸宁方言词汇研究》（2009）、《咸宁方言研究》（2015）、《阳新方言研究》（2016）等学术著作，发表了《湖北阳新方言的小称音变》（1993）、《崇阳方言本字考》（1993）、《大冶方言的双宾句》（2000）、《论咸宁方言词汇的特色》（2015）等一批研究论文。这些论文涉及语音、词汇、语法、文字、文化等各个层面。对这些论文加以搜集和梳理，选择其中有代表性的论文编印成集，这对于读者宏观了解鄂东南方言研究的基本状况，切实推进鄂东南方言的深入研究，是有积极意义的。

主编王宏佳师从我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汉语方言，毕业后任教于湖北科技学院，辛勤耕耘于方言园地。他不光对自己的方言——咸宁方言有深入的研究，对鄂东南方言的研究状况也很熟悉。他广搜文献，细心研读，从中精选出40篇论文。这些论文涵盖面广，能够以点见面，展示鄂东南方言研究的重要成果。

论文集还附录了到目前为止关于鄂东南方言研究的全部文献。应该说，这项工作是值得赞赏的，体现了主编繁荣学术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鄂东南方言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离事实的精确描写、规律的深刻揭示还有相当的距离。论文集所反映的成果可以看作是鄂东南方言研究的起点。“路漫漫其修远兮”，鄂东南方言的研究，任重而道远。

汪国胜

2018年8月16日

鄂东南方言研究综述（代前言）

王宏佳

一、鄂东南方言

鄂东南方言，是指湖北省咸安区、通山县、崇阳县、通城县、嘉鱼县、赤壁市、阳新县、大冶市共五县二市一区所在地的方言。

鄂东南方言是公认的湖北省内最复杂的方言，不仅与周边方言有差异，各县市区方言之间的分歧也相当大，内部交际非常困难。外地来鄂东南求学的学子、做生意的商人、偶尔来走亲访友或游玩的过客，无不时刻感受到鄂东南方言的与众不同，感叹鄂东南方言实在是太难懂了，有些刻薄的人甚至称之为“鸟语”。^①

鄂东南方言很早就引起学者的关注和重视。194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赵元任、丁声树、杨时逢、吴宗济、董同龢出版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对鄂东南各县市区的方言均有分地记录；1982年，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桥本万太郎特地来华调查鄂东南方言（詹伯慧、李元授，1987）；省内一些高校在划分方言调查区域时，都希望到鄂东南来，2002年，湖北师范学院黄群建教授带领团队对鄂东南各县市区的方言进行了语音调查；省外专家也有过研究鄂东南方言的计划，2004年，北京语言大学曹志耘教授率领几位博士研究生来鄂

^① 详见《咸宁地名（相声）》，原题为《咸宁风貌》，发表在《咸宁文艺》，1980年第1期。

东南调查方言,为《汉语方言地图集》采集数据。

对于鄂东南方言的归属,《湖北方言调查报告》(1948)把崇阳、嘉鱼、大冶、阳新、通山、咸宁、通城、蒲圻等鄂东南八县方言归入湖北方言第三区,认为这第三区最特别,内部也最复杂,大致可以归入赣语系统;《湖北方言概况(初稿)》(1960)则把鄂东南方言归入鄂南边界区(比《湖北方言调查报告》的第三区多了监利),有别于西南官话区、楚语区;《中国语言地图集》(1987)经过进一步的调查,把鄂东南方言划归赣语大通片。不过,从人口迁徙、地理环境以及方言自身等多方面的情况来看,鄂东南方言与湘语、赣语均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陈有恒先生在讨论鄂东南方言时说:“以本区方言主要特征与湘语及省内东北部方言比,它们之间很难完全分开,与赣语比,似乎也很难完全吻合,联系詹伯慧教授在《现代汉语方言》中所叙情况来看,则湘鄂赣这一三角边缘地带的语言特征,实在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①这段话很好地说明了鄂东南方言的现状,要真正搞清楚鄂东南方言的归属,还有待我们进一步深入地调查研究。

二、鄂东南方言研究

关于鄂东南方言的研究,最早的是《湖北方言调查报告》(1948),之后是《湖北方言概况(初稿)》(1960),这些属于报告性质。单点方言的深入研究,由詹伯慧、李元授两位先生发其端,在《武汉大学学报》上发表了《鄂南蒲圻话的语音特点(蒲圻方言研究之一)》(1964年第1期)。时隔23年,又在《武汉大学学报》上发表了《鄂南蒲圻话的词汇语法特点》(1987年第5期),相当于上文的姊妹篇。

紧随其后,原咸宁师专中文系陈有恒教授先后在《教学参考》(《湖北科技学院学报》前身)上发表《咸宁话声调与古话、普通话声调的关系》(1979年第1期)、《鄂东南方言的特征》(1979年第2期),此后一发不可收拾,围绕咸宁话、蒲圻话以及整个鄂东南方言,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并出版多部著作,成为鄂东南方言研究的领军人物,提升和扩大了鄂东南方言的地位和影响。

^① 详见《鄂南方志略》,陈有恒编,咸宁地区地方志办公室,1991年版。

湖北师范学院黄群建教授(主要关注阳新方言、通山方言)发表《阳新方言说略》(1989),华中师范大学汪国胜教授(主要关注大冶方言)发表《大冶话的“倒”字及其相关句式》(1992),相继开始鄂东南方言的研究,成为湖北省研究鄂东南方言问题的骨干力量和专家。其中黄群建教授先后出版《通山方言志》(1994)、《阳新方言志》(1995)、《鄂东南方言音汇》(2002)、《阳新方言研究》(2016),并在《方言》等刊物上发表了一批有影响的论文;汪国胜教授出版了《大冶方言语法研究》(1994),并在《中国语文》《方言》《语言研究》等权威刊物上发表了数量众多的论文,带领一批青年学者先后进行了大型项目“湖北省方言研究”“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方言调查项目”的调查和研究,把鄂东南方言的研究向纵深推进。

此外,省内的一些专家、学者和青年学生,如董为光、范新干、万献初、刘宝俊、李佳、张勇生、张振兴、曹志耘、李建校、熊桂芬、鲁娜、甘紫丹等人,因为各种因素:研究兴趣、求学、地缘、母语情结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到鄂东南方言的调查研究中来。地方高校湖北科技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的一批中青年老师如祝敏鸿、尤翠云、谢文芳、王宏佳、李爱国、祝敏、王玉、徐海东等人,在鄂东南方言的调查和研究中,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是汪国胜教授重大方言研究项目中鄂东南方言调查和研究团队的骨干成员。

截至目前,我们搜集到的关于鄂东南方言研究的文献总数接近200篇(部),其中县志或市志8部,报告2部,专著15部,论文153篇,硕士论文13篇,博士论文3篇。

八个县市区都有县志、市志,且在2012至2016年间都有修订,其民俗方言部分,分别对各县市区的方言进行了介绍,《湖北省志》也有“方言”的论述(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6);另有两部大型报告,分别是:《湖北方言研究报告》(赵元任等,1948)、《湖北方言概况》(初稿)(湖北省方言调查指导组,1960)。多数方言点有方言志或方言研究专著,咸安:《咸宁方言词汇研究》(王宏佳,2009),《咸宁方言研究》(王宏佳,2015),《咸安区方言志》(吴培根,2012),《咸宁话》(陈大银,2017);通山:《通山方言志》(黄群建,1994);阳新:《阳新方言志》(黄群建,1995),《阳新方言研究》(黄群建,2016);赤壁:《蒲圻方言》(陈有恒,1989);通城:《通城方言》(刘国斌,1991),《通城方言词典》(刘

国斌、黎立夏, 2016); 大冶:《大冶方言语法研究》(汪国胜, 1994)。还有综合性或对比性研究文献, 如《蒲圻话·普通话字音对应表》(陈有恒, 1989), 《鄂南方志略》(陈有恒, 1991), 《鄂东南方音辨正》(陈有恒、尤翠云, 2002), 《鄂东南方言音汇》(黄群建, 2002)。下面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对研究鄂东南方言的文献(主要是论文)进行说明。

(一) 语音研究

1. 音系的研究。研究鄂东南方言音系的, 如《鄂东南方音辨正》(陈有恒、尤翠云, 2002), 《鄂东南方言音汇》(黄群建, 2002), 《鄂东南赣语语音研究》(张勇生, 2011), 其中, 《鄂东南方言音汇》自出版以来, 被众多方言研究者引用; 研究单一方言或者方言点音系的, 如上文提到的方言志和方言研究著作, 以及论文《鄂南蒲圻话的语音特点(蒲圻方言研究之一)》(詹伯慧、李元授, 1964), 《蒲圻方音与古音的关系》(陈有恒, 1984), 《通城黄袍语音特点》(邓晓华, 1986), 《湖北崇阳方言音系及特点》(刘宝俊, 1988), 《通山方言的语音特征》(黄群建, 1990), 《通城方言语音分析》(祝敏鸿, 2002), 《崇阳(天城)方言声系分析》(张道俊, 2006), 《湖北通城方言的语音特点》(曹志耘, 2011), 《崇阳县沙坪话音系》(欧阳澜, 2018); 其他比较研究, 如《皖、鄂、赣交界区域三片方言的音韵比较研究》(郑婷, 2015), 《〈凡海书〉与嘉鱼方音》(王琪, 2008), 《湖北大冶金牛方言语音及其比较研究》(卢刚, 2017)。

2. 声母的研究。鄂东南方言送气声母较多, 如《湘鄂赣三界方言的送气声母》(董为光, 1989); 通城、崇阳、赤壁三地的全浊音声母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 如《论湘鄂赣边界地区赣语中的浊音走廊》(陈立中, 2004), 《鄂东南通山方言古全浊声母的今读类型》(张勇生, 2011); 中古某一声系或某一声母的研究, 如《通城(麦市)话群母溪母字的读音》(李建校, 2005), 《通城(麦市)知系字的读音》(李建校, 2007), 《释鄂东南方言来母和透定母的特殊读音》(熊桂芬, 2010), 《残存形式与新生形式的分布——以鄂东南赣语[v]声母的分布为例》(张勇生, 2011), 《鄂东南赣语v声母的来源及其分布》(张勇生, 2013); 鄂东南方言声母在方言接触中的现代发展, 如《从语言接触看嘉鱼县马鞍山话的语音层次》(熊桂芬、汪璞赟, 2011), 《咸宁—武汉方言接触中声母 tɕ、tɕh、

ç 的变异》(万献初, 2012)。此外, 学者们在鄂东南方言尖团音、古无舌上音、古无轻唇音等问题上作了一些有益的探讨。

3. 韵母的研究。《阳新方言古牙喉音及泥母对韵母的影响》(黄群建, 1997), 《鄂东南方言东片山咸摄舒声字》(祝敏鸿, 2004), 《通山南林话读中古开口一等韵为齐齿韵的考察》(范新干, 2008), 《鄂东南方言蟹假果摄的主要元音及相关问题》(李佳, 2010), 《通城塘湖方言的“东冬有别”》(栗华益, 2011)。通过他们的研究, 人们对鄂东南方言韵母的一些特点, 如单元音多, 鼻化元音多, 后鼻音少等, 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

4. 声调的研究。鄂东南方言声调的研究, 主要体现在入声的研究上, 如《通城方言入声的特点》(祝敏鸿, 2002), 《大冶金牛方言入声分析》(张春红, 2016), 《大冶金牛方言入声研究》(张春红, 2017); 鄂东南方言入声复辅音韵尾, 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兴趣, 如《通城入声的复辅音韵尾》(陈有恒, 1987), 《湘鄂赣三界方言的“l”韵尾》(董为光, 1987), 《鄂东南通城方言入声韵尾演变研究》(张勇生, 2012), 《试析湖北通城方言的入声韵尾》(栗华益, 2013)。比较一致的看法是, 阳新方言的声调分四类, 大冶分五类, 其余六县(市)都分六类。

5. 小称音变及变音的研究。《阳新三溪话的小称形式》(何天贞, 1982), 《湖北阳新方言的小称音变》(黄群建, 1993), 《湖北阳新三溪赣语人称代词的变音》(王功平, 2007)。

6. 文白异读的研究。《蒲圻话中的文白异读》(刘兴策, 1982), 《湖北咸宁方言的文白异读》(王宏佳, 2008), 《崇阳方言文白异读分析》(张道俊, 2011)。

(二) 词汇研究

系统研究鄂东南方言词汇的文献, 如前文提到的方言志和方言研究著作, 一般都有分类词表, 较为详尽地记录了各县市区常用方言词汇。此外还有硕士论文《湖北大冶方言词汇研究》(熊雯, 2009), 博士论文《湖北咸宁方言词汇研究》(王宏佳, 2007)。

值得说明的是, 《咸安区方言志》是咸安区第一部方言志, 作者吴培根先生

怀着对故乡的热忱，耄耋之年，历尽艰辛，从老派咸宁方言的视角，较为全面地介绍了咸宁方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并考证了大量口语词的本字。《咸宁话》则是陈大银先生凭借自己的爱好和热情，遍访乡野，历时九年，收录咸安、嘉鱼、赤壁、通城、崇阳、通山六县市区 1.2 万条方言词语。吴培根和陈大银二位先生是民间方言爱好者和研究者的杰出代表，他们所做的研究或许还不够专业，但为方言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珍贵的方言数据。

《咸宁方言词汇研究》由王宏佳的博士论文改写而成。以湖北省咸宁市方言的词汇为研究对象。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整理出咸宁方言词汇表，再以词汇表为依托，进行了纵、横两个方面的对比研究。横向比较包括咸宁方言词汇与北京话词汇的对比研究；咸宁方言词汇与周边方言词汇的对比研究；咸宁方言词汇与七大方言区代表方言词汇的对比研究。纵向比较包括咸宁方言词汇与《诗经》《论语》《楚辞》《说文解字》《方言》《广韵》《集韵》及其他古代文献词汇的对比研究，同时考证了部分咸宁方言口语词的本字和语源。通过对比研究，提取和描写了咸宁方言词汇特征词语。最后结合语音和词汇两个方面的标准对咸宁方言的归属问题给出了一个阶段性的结论。

其他研究论文，有的高屋建瓴，对鄂东南方言词汇的整体特征进行了说明，如《鄂南方言的词汇特点》（陈有恒，1989）；有的着眼于口语词的探讨，如《蒲圻口语词考释》（陈有恒、李元授，1985），《〈论语〉词语在现代咸宁口语中的反映》（万献初，1990）；较多文献对方言的代词进行了封闭描写，如《湖北蒲圻话的人称代词》（陈有恒，1990），《湖北阳新方言的代词》（黄群建，2002），《通山方言的代词》（石桂芳，2008），《通山方言的人称代词》（石桂芳，2008），《大冶金牛方言的人称称谓及人称代词》（张春红，2013），《湖北崇阳方言代词研究》（甘紫丹，2014）；有的着重描写方言称谓语，如《鄂东南方言称谓词使用情况考察》（陈晓云，2014），《鄂湘赣三界方言亲属称谓语比较研究》（王玉，2016），《咸宁方言的特殊称谓语》（陈大银，2017）；有的归纳某一县市区方言词汇的特点，如《鄂南蒲圻话的词汇语法特点》（詹伯慧、李元授，1987）、《论咸宁方言词汇的特色》（王宏佳，2015）；有的探讨方言造词理据或构词情况，如《湖北咸宁方言词与普通话词造词理据比较研究》（王宏佳，2009），《湖北咸宁通城方言词汇构词研究》（聂依丽，2015）；有的探讨方言颜色词，如《湖

北大冶方言中的颜色词探究》(胡丹青,2009),《浅析湖北赤壁方言中的颜色词》(柳媛,2010);有的探讨某一类或某一个词,如《大冶方言的物量词》(汪国胜,1993),《大冶话里的状态形容词》(汪国胜,1994),《湖北大冶话的语气词》(汪国胜,1995),《湖北通城方言的量词“隻”》(万献初,2003),《咸宁方言语气词“呃”的考察》(鲁娜,2011),《咸宁方言叹词、语气词及其呼应关系研究》(鲁娜,2012)。

(三) 语法研究

1. 相关句式的研究。鄂东南方言很多地方表示进行体一般不用“着”而用“倒”,如“坐着”就是“坐倒”,“看着”就是“看倒”,如《大冶话的“倒”字及其相关句式》(汪国胜,1992);比较句的研究,如《湖北大冶方言的比较句》(汪国胜,2000),《咸宁方言差比句式特点及语用价值》(王玉,2007);双宾句的研究,鄂东南方言双宾句的宾语顺序往往与普通话相反,“给我一本书”得说“把一本书我”,“奖励你一辆车”得说“奖一乘车你”,如《大冶方言的双宾句》(汪国胜,2000),《赤壁方言双宾句及相关问题研究》(陈莉琴,2009),《嘉鱼方言双宾句的配价研究及认知分析》(谢文芳,2010);“把”字句和“把得”句的研究,鄂东南方言“把”字一身兼两职,既可表示“处置”也可表示“被动”,因此,“牛把草吃了”与“草把牛吃了”是等义的,如《湖北通山方言的“把得”被动句》(范新干,2003),《湖北通山方言的动词“把得”句》(范新干,2004),《咸安方言特殊“把”字句“把+NP+VP+上”探讨》(朱文涛、陈淑梅,2010);被动句的研究,如《阳新方言被动句研究》(陈晓云,2007),《崇阳方言的“把得”被动句》(祝敏,2017);其他句式的研究,如《湖北大冶方言两种特殊的问句》(汪国胜,2011),《浅析湖北崇阳方言的几种特殊句式》(石玉利,2015)。

2. 特定词语或词类用法的研究。这些研究往往与上面的句式研究有重叠和交叉,如《鄂南方言里的“把”“到”“在”》(陈有恒,1982),《湖北方言的“在”和“在里”》(汪国胜,1999),《咸宁话的“到”》(徐海东,2005),《浅析崇阳方言中“刮”与“完”字的用法》(姜雯洁,2009),《湖北阳新方言表进行或持续的助词“得”》(余娟娟,2009),《湖北崇阳话中的“点子”和“点把”》(祝敏,2009),《湖北通城方言词“到”探讨》(胡勃,2010),《通山方言中“得”的几

种用法》(华娇,2011),《鄂东南方言句首语气词“啊”及其用法来源分析》(陈晓云,2011),《大冶方言否定词研究》(赵发明,刘鹏,2013),《大冶方言的“在里”和“过来”》(汪国胜,2016),《通城方言名词性标记“者”》(何洪峰、黎立夏,2017)。《“把得”在崇阳方言中的语法化动因和演变机制》(祝敏,2017)。

3. 特定结构的研究。《从共时角度考察崇阳方言里的“别个1”与“别个2”》(万祎,2013),《崇阳方言“X把两X”结构多视角考察》(王欢,2016),《崇阳方言中的动词重叠式“VV神”》(聂环,2017),《湖北崇阳方言形容词重叠式“AAB崽”小议》(聂环,2017)。

4. 宏观研究。有的着眼于鄂东南方言语法的共性,如《鄂南方言的几个语法现象》(陈有恒,1990),更多的是着眼于特定方言的语法现象,如《鄂南蒲圻话的词汇语法特点》(詹伯慧、李元授,1987),《大冶方言语法札记》(汪国胜,1994),《大冶方言语法研究》(汪国胜,1994),《湖北崇阳方言语法札记》(徐琦,2008),《湖北大冶方言的全句功能范畴》(熊雯、马宏程,2012)。

5. 语缀的研究。如《湖北大冶方言的语缀》(汪国胜,1993),《湖北咸宁方言的语缀》(王宏佳,2006)。

(四) 其他研究

除了语音、词汇和语法这三个方面的研究外,鄂东南方言的研究还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方言与文化研究。如《通山地名的命名规律》(杜燕山、程时生、曾汉珠,1985),《咸宁—武汉方言亲属称谓词的接触与变异——以“女称男化”的消变为例》(万献初,2009),《湖北阳新方言中的“父亲”称呼研究》(何焯,2009),《鄂东南通城方言中“女性称谓”缺失的原因初探》(何岳球,2010),《论鄂南文化的特色——方言视角下的管窥》(王宏佳,2011)。

2. 方言考本字。如《崇阳方言本字考》(刘宝俊,1993),《湖北嘉鱼方言本字考》(李爱国,2004),《咸宁方言俗语词火部本字》(祝敏鸿,2005),《湖北嘉鱼方言形容词本字考》(李爱国,2006),《湖北嘉鱼方言本字考证》(李爱国,2008),《咸宁方言常用词考本字与溯源》(王宏佳,2010),《鄂东南通山方言一组本字及其音韵特点》(范新干,2016)。很多口语词在书面语中原有

本字可写,后来由于方言的分歧,音义关系慢慢湮灭,导致很多口语词嘴上能说,手上却不能写,成了有音无字词。根据古今语音演变的规律,做到音义俱合,同时辅以文献佐证,推求方言本字,并非钻牛角尖,也不是无所事事,相反是方言研究的有益补充,对方言语音、方言词语的古今演变和对比以及方言系统的深入研究,都是很有作用的。如鄂东南多数地方不说“烤火”,而要说“炙火”。“炙”,“之石切”正与咸宁“炙”的读音[tʂa⁵⁵]相吻合,“炙”本义是“炮肉也”,相当于做红烧肉,引申以后,“炕火曰炙”,原指北方烧炕暖身,南方无炕可烧,炙就直接用来表示给人体取暖。(王宏佳,2010)嘉鱼、赤壁等地“冷水”要说“奥水”,“奥”本义是“房屋的西南角”,按照古代房屋的结构,西南角是光线最暗淡的方位,古代祭祀时用来设神主或为尊者居坐之处,引申以后表示“神秘”,而鄂东南方言则从光线暗淡引申出“阴凉”之意,“奥水”也就是“凉水”。(李爱国,2008)

3. 方言与普通话推广。有的侧重于方言字音与普通话读音的对照关系的研究,如《蒲圻方言与普通话语音的对应关系》(陈有恒,1987),《蒲圻话·普通话字音对应表》(陈有恒,1989),《古知照系字在嘉鱼方言中的流变及其与普通话的对应关系》(谢文芳,1998),《大冶话与普通话的语音比较》(殷宏、夏恩德、刘绍军,2004);有的侧重于声母的对比研究,如《通城话和普通话声母之比较》(雷凤珍、殷凌燕,2000),《从中古音看嘉鱼话与普通话声母的关系》(殷凌燕,2002),《“咸安普通话”的声母语音偏误及咸安人学习普通话声母的重点与难点》(赵巧丽,2013),《校正咸安普通话声母偏误的教学策略》(赵巧丽,2014);有的侧重于韵母的对比研究,如《通城话与普通话韵母之比较》(李爱国,2002),《嘉鱼方言鼻音尾韵母的历史流变及其与普通话的对应关系》(谢文芳,2008);有的侧重于声调的对比研究,如《咸宁话声调与古话、普通话声调的关系》(陈有恒,1979),《从中古音看咸宁话与普通话声调差异及对应关系》(尤翠云,2002),《“咸安普通话”声调语音偏误成因分析及教学对策》(赵巧丽,2014),《“咸安普通话”的声调偏误探析》(赵巧丽,2014)。

4. 方言母语对第二语言习得的影响。如陈晓娟《论咸宁方言对英语语音习得的负迁移作用——以元音为例》(2011)、《论咸宁方言对英语语音习得的负迁移作用——以辅音为例》(2012),运用第二语言习得理论中的“母语迁移”

理论,分别从元音、辅音两个角度,探讨了咸宁方言对英语语音习得的负迁移作用。

5. 鄂东南方言研究综述。如《鄂南方言研究综述》(甘紫丹,2013),《湖北阳新方言研究综述》(刘晓艳,2014),《通城方言研究综观与展望》(黎立夏、何洪峰,2016)。

三、优势与不足

鄂东南方言研究最大的优势,就是方言资源丰富。各县市区方言分歧非常大,方言间基本上不能互相通话,严重的情况下,有些方言内部村与村之间都有不同,例如阳新方言,被称为“九板十三腔”。方言的价值在于差异,在于特色,在于人无我有,鄂东南方言犹如一座巨大的资源宝库,等待着人们去发掘。

鄂东南方言研究的优势也表现在研究队伍上,人数众多、分布广泛。以下是人员分布和所在单位情况。高校:北京大学(1人:李小凡)、北京语言大学(1人:曹志耘)、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1人:张振兴)、华中师范大学(4人:刘兴策、朱建颂、汪国胜、范新干)、武汉大学(4人:李元授、万献初、熊桂芬、李佳)、华中科技大学(2人:董为光、何洪峰)、中南民族大学(4人:何天贞、刘宝骏、邵则遂、汪璞赟)、暨南大学(2人:詹伯慧、王功平)、南京大学(1人:陈立中)、厦门大学(1人:邓晓华)、江西师范大学(1人:张勇生)、安徽大学(1人:栗华益)、湖北师范学院(2人:黄群建、张道俊)、湖北科技学院(13人:陈有恒、雷凤珍、尤翠云、何岳球、祝敏鸿、谢文芳、殷凌燕、王宏佳、李爱国、祝敏、王玉、徐海东、徐琦)、湖北第二师范学院(1人:欧阳澜)、咸宁职业技术学院(3人:陈晓云、陈晓娟、赵巧丽)、晋中学院(1人:李建校)、武汉工程大学(1人:黎立夏)、湖北理工学院(1人:罗建军)。通城县方志局(1人:刘国斌)。退休教师(2人:陈大银、吴培根)。

其他单位不详,主要是求学期间发表过与鄂东南方言有关论文的人员34人:曾媛媛、陈莉琴、杜燕山、程时生、曾汉珠、何焯、胡勃、胡丹青、甘紫丹、华娇、姜雯洁、廖素婷、刘丽、刘晓艳、柳媛、卢刚、聂环、聂依丽、饶玲、余娟娟、石桂芳、石玉利、万祎、王欢、王琪、熊雯、殷宏、夏恩德、刘绍军、张春红、

赵发明、刘鹏、郑婷、朱文涛。这批青年学者无疑是未来鄂东南方言研究的主力军。

以上研究人员有一大批是专家、教授、博士生或硕士生导师，如李小凡、曹志耘、张振兴、刘兴策、朱建颂、黄群建、汪国胜、范新干、詹伯慧、李元授、万献初、熊桂芬、董为光、何洪峰、何天贞、刘宝俊、邵则遂、汪璞赟、王功平、陈立中、邓晓华、张勇生。一方面，鄂东南方言引起了他们的关注和重视，另一方面，他们所做的研究，反过来又吸引更多的学者来关注和重视鄂东南方言。论文所发表刊物的级别也很高，其中《方言》：12篇；《语言研究》：13篇；《中国语文》：2篇。刊物级别高，固然与学者自身的影响力有关，也跟他们所描述的方言事实的学术价值有关，这恰好证明了鄂东南方言的特殊和价值。

此外还有一些民间力量，自发组织活动，拍摄视频，在网上宣传和发布方言小文章，更有人自掏腰包出版方言文献，如吴培根、陈大银，是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

鄂东南方言研究的优势还表现在前期研究成果较为丰硕，假以时日，会有越来越多的、越来越有分量的成果面世。

不足之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单点方言的系统研究还不够。目前除咸宁、通山、通城、赤壁、大冶、阳新有方言志或方言研究之类的著作外，嘉鱼、崇阳还没有，这既是空白，也是遗憾。

二是偏重于语音的调查和描写，词汇和语法的研究偏弱。

三是对比研究还不够，除《鄂南方言志略》《鄂东南方音辨正》《鄂东南方言音汇》之外，鄂东南方言间的对比研究，鄂东南方言与周边方言的对比研究，还有待加强。

四是方言调查研究还停留在传统的口耳之学上，利用计算机进行辅助研究的不多，方言声韵调的确定，方言数据的分析，普方古之间的对比研究，方言数据库的建立，依然还是薄弱环节。

五是方言与文化的结合研究还不够。如鄂东南方言与传统文化、苗瑶文化的结合研究。

六是没有形成合力，目前来看主要是单兵作战。校内合力，校外联手，建

立方言研究的团队并不多，我们要学习华中师范大学汪国胜教授，带领一批中青年学者，在“湖北省方言研究”“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方言调查项目”中，建立了良好的合作。

最后是部分研究人员的水平有待提高。相当一部分人员主要从事普通话推广工作，有的在读研期间发表过一二篇与方言有关的文章，走上工作岗位后，基本上不再写方言文章；有的则一直着眼于方言与普通话的对应关系，没有广度和深度。我们要向朱建颂、陈有恒两位先生学习，他们最初也是从普通话推广工作做起，一步一步地走上方言研究的道路，在方言研究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四、展望和规划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我们的感觉是，鄂东南方言的研究不是做透了、无事可干了。相反，我们深感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首先，我们要进一步做好鄂东南方言的深入研究。争取在三到五年之内，把八个县市区的方言志或者方言研究之类的著作出齐，不留空白。

其次，我们要做好对比研究。一是横向对比研究，既包括鄂东南方言内部的对比研究，其中单点的方言调查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但方言间的差异和共性还没有很好地总结；也包括鄂东南方言与周边方言，尤其是湘方言、赣方言的比较研究，考虑到人口、地域、交际等因素，三者之间的关系盘根错节，需要进一步加强对比研究。二是纵向对比研究，鄂东南方言保留古语较多，而且时间层次各不相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鄂东南方言就是“活化石”，加强纵向古今对比研究，有助于解释鄂东南方言复杂、特殊的原因，也有助于揭示和还原古代汉语的真实面貌。

再次，我们要加强词汇的研究。目前全国的汉语方言研究，大都着眼于方言语音面貌和特征。实际上，就某一方言而言，内部语音差异严重的一村一个口音，这就说明单纯执着于方言的语音是没有出路的。有些方言的语音固然我们能分辨清楚，如果不结合意义来分析，依然等于一窍不通。比如“爹爹”，有的方言表示“爷爷”，有的表示“外公”，有的表示“叔叔、伯伯”、有的还可以